

# 藝術消逝最後的靈光：談路易·康印度、孟加拉兩件作品

## The Last Divine Light of a Vanishing Art: Louis Kahn's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hmedabad and National Capital of Bangladesh, Dhaka

文 |  
徐明松  
Shyu Ming-song  
銘傳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當我們嘗試客觀地評估路易·康在國際建築的文化脈動中所留下的遺產時，可能會發現其結果是相當具破壞性而不是建設性的。甚至，其產生的結果，阻斷了新的傳統 (*tradizione del nuovo*) 的「神聖法則」 (*sacri principi*) 永恆輪迴 (*eterno ritorno*) 神話的所有可能性，同時開啟了晦澀難解的鄉愁敘事空間。那是一個審視自身生命事件符號的鄉愁，在搜尋的當兒，失足於不可言喻的迷宮中，在此，他遺失了自身指涉的對象；一個得先消解建築本身自存於世才能穿越的鄉愁論述；一個遊走於典範 (*norma*) 與違逆 (*trasgressione*) 間使人安心的關係的鄉愁，能衍化出——通過蒸餾器滌化斷裂與掙扎——話語 (*parola*) 的「流通性」 (*circolarita*)、豐腴性 (*pienezza*) 及自覺到自身限制的宏偉性 (*globalita*)。

孟加拉國會大廈大階梯前  
© 徐明松攝影

然而，對消逝話語的找尋必然導致話語的再次消逝。歐洲觀察家向來低估路



易·康作品中那份亟欲找回神話的深層「美國性」。沒有共同根基（fondazioni collettive）的神話只是康作品中令人不安的一面。他的作品——就像一種充滿吊詭的救贖儀式——試著將建築話語的衍生緊密地連接到體制神話的人造建構物上。他認為只有重新建立（在絕對獨斷與沒有外部參涉的制約下）建築話語與體制間的新血約，才能讓「急進」（radicale）建築的創作核心觀念——儘管一廂情願——取得合理地位：從耶魯美術館到達卡市政廳，我們看到對「類比建築」（architettura dell'analogia）的鍥而不捨，他在這裏建構的主要戰鬥目標，正是現代運動的中心困局；也就是說，建築是「可忽略的客體」。

——Manfredo Tafuri，〈藏不住秘密的首飾盒〉<sup>1</sup>

## 前言

連續三年至印度、孟加拉看柯比意、路易·康（Louis Kahn，1901-74）的作品，當然也兼及其他印度建築師，像近九十歲仍努力不懈的多希（B. V. Doshi，1927-）及當紅的孟買工作室（Studio Mumbai）的主持人雋（Bijoy Jain，1965-）的作品。

第一次是自助旅行，較刺激，感受強烈，也就愛上了印度，第二、三次專業旅行社安排，跟一群熱愛建築的朋友一塊去，又有領隊又有地陪，食宿皆悉心照料，較安心，再加上歷史、社會背景解說詳盡，收穫亦不少。這些國家的旅行，在印象中，總被人視為畏途，原因不外是混亂、衛生條件不佳或治安不好等既定成見，但幾次旅行後，發現有許多驚訝，因為剝除表面真實存在的亂象，總可以觸發許多發人深省的事情。譬如殖民歷史的殘留、宗教的衝突、種性制度的問題、現代化的進程與看法，與華人在宗教文化的分享……，這是我們習慣來往於日本或韓國不容易思索的問題，或像我這種在義大利待了近十年，歐洲旅遊有時也成為一種慣性，不再能激發新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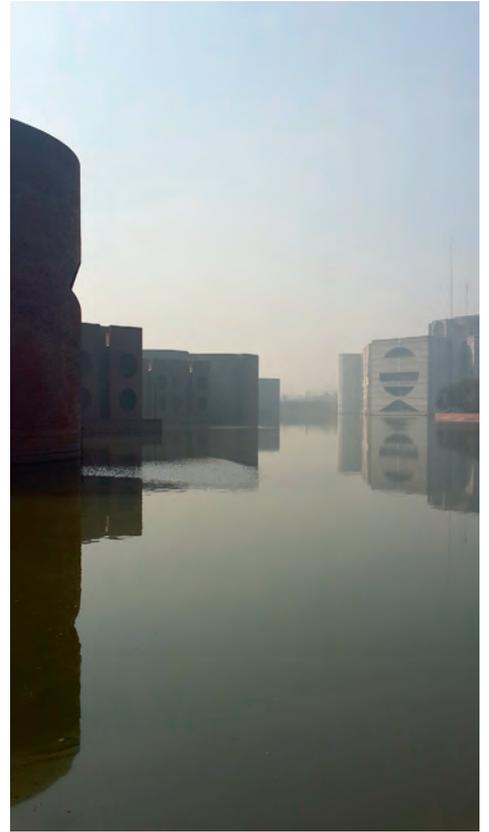
三趟旅行共看了三棟路易·康的建築，都是晚年的作品，規模亦都宏偉，一是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1962-74）在印度綿織業大城艾哈梅達巴德（Ahmedabad）的分校，二、三則是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Dacca）的國會大廈（Sher-E-Banglanagar，National Capital，1962-74）及周邊建築群，與距離不遠的國立醫院（Sher-E-Banglanagar Suhrawardhy National Hospital，1966-67）。三次旅行也都同時參觀了柯比意在香地葛（Chandigarh）與艾哈梅達巴德設計的建築，當然其中也走訪了不少印度老城市與古建築，感受一下「遙遠」國度的異樣氛圍，這樣的旅行比較完整，對建築有興趣的人也比較能體驗到建築發生的社會背景與其在時間演變中的傳承與創新。

## 美國脈絡下的路易·康

嚴格說來，美國建築在萊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之後，五、六〇年代就屬康與范裘利（Robert Venturi，1925-）的建築語言最為獨特與並受到矚目，或者說，他們的作品最能傳達美國文化的深層性，試想一個由歐洲移民為中心組成的國家，當所有的文化都是外來的，尤其是來自歐洲，語言的創作如何回歸「土地」？及如何建立自己的傳統？這自然成為關心文化各領域知識份子焦慮的來源。我們在萊特的「大草原屋頂」或部分擷取自美國原住民文化圖騰語彙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證明。我們知道建築「語言」的生產，無論是實質需求或心理需求，剛開始多數是被「地理」所囚禁，也就是說物理氣候、材料取得難易、防禦……等因素決定了形式最初的樣貌，久了自然成為每一

左圖——  
孟加拉國會大廈宿舍區  
© 徐明松攝影

右圖——  
孟加拉國會大廈宿舍區與議會大樓  
© 徐明松攝影



地方的獨特風格，風格相近的氏族最後又結合成民族，形成在文化上較為接近的生命共同體。像美國或台灣這樣由外來文化綜合而成的國家，自然也有此困境。

緊接著有兩組辯證性的論點將因上述的困境而產生，一是「歷史」，另一是「自然」，仍以萊特為例說明的話，他的「大草原屋頂」就是一種想跟土地／自然對話的創新語彙，而美國原住民語彙的引用則是反歐洲，並回到土地／歷史的手法。緊接著五、六〇年代登場的康與范裘利則將此困境更入極端，誠如塔夫利所說：「創造了一個沒有宗教的神秘學派，范裘利則建立了一個再也沒甚麼值得違逆的除了魔的學派。但兩者都同屬自我投射（*autoriflessione*）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為了能體現瀰漫在不安知識分子中那份邊緣化的共通心態，他們超越自身歷史，在他們意識流放中建立起一個王國：就像 *Bataille*（但表達方式及工具完全不同），為了避免眼睛在這世界有失明的危險，他們反轉眼球面向自身」。當然建築語言的歷史分析無法簡單概括，尤其是萊特的作品。不過初步掌握住美國文化發展的獨特性，也就是康作品背後的歷史成因，將有助於我們分析他作品中的詩意有時幾近晦澀難解，甚而帶神秘主義況味的語言。

## 羅馬之旅（1950）

康在賓州大學這所老牌建築系接受傳統的布雜教育（編者按：法文譯名，美術教育），1924年畢業，1928年做了第一趟歐洲之旅。此時歐洲的現代建築已如火如荼展開十來年，柯比意的薩沃伊別墅與密斯的巴塞隆納德國館已開始構思，隔年完工，雖然傳統的布雜訓練可以提供康不差的美感教育與專業紀律，但對於新技術所帶來的形式革命，反應卻相對遲慢與不足，因此這趟旅行他只專注於中世紀建築，尤其是城堡環繞的城鎮，那種堅實與

封閉顯然引起了他的興趣，但對前衛主義建築的提問或研究成果似乎不感興趣，這也說明了五〇年代前的作品仍處在摸索階段，算是位大器完成的建築師。隨後經歷很長的教書與執業生涯，從事過許多不同類型的設計工作，這些工作相信持續地幫助他探索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靈魂。1950年，近五十歲的康，獲得一筆美國學院（American Academy）提供的經費，在羅馬研究一年，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可徹底擺脫日常煩瑣生活，浸淫在古羅馬遺跡裡，追尋亙古的記憶，最終讓康的語言找到詩意的出口，並建立了自己創作的語言體系。

這語言體系到底是甚麼？塔夫利這麼說：「在五〇年代中至六〇年代間的歷史洪流裏，康堅持的創作姿態，別具象徵意義且有跡可尋。『史前洪荒時代』（Avant le deluge），我們只能惴惴不安地建造諾亞方舟：如所知，方舟的建造對那些將被巨浪吞噬的人具有完整的象徵性及自豪的奇異性。然而，無論誰目睹了1968年那次令人又期待又懼怕的『洪流』（deluge），或無論誰親臨這場暴風雨，皆發現只要撐開一把傘或築一道堤坊來抑止洪水的氾濫，即可阻擋一切，而康試圖推擠著進入的著了魔的城堡，整個建構顯得如此地搖搖欲墜：甚至像欲避開世俗百姓干擾之僧侶隱居或謄抄珍貴手稿的避難所。<sup>2</sup>」

當然塔夫利對此建築空間的形容，指出了康語言傳達的氛圍與企望。他語言中看似相似的古羅馬建築不可能再是古羅馬，不同時代因建造技術的差異，讓古羅馬的磚石承重牆與康以磚包覆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系統，絕對有所不同，可以想像羅馬萬神殿需要五公尺的牆來承受半圓頂所產生的外推力，但康的孟加拉國會大廈卻只需五十公分厚的鋼筋混凝土就可撐起更雄偉的建築。這也是為什麼塔夫利形容康的建築「整個建構顯得如此地搖搖欲墜：甚至像欲避開世俗百姓干擾之僧侶隱居或謄抄珍貴手稿的避難所」。牆相對於整個建築變成一道薄膜，看似堅實卻無法令人安心，康晚年的建築走向了令人困惑的內心世界，語言的來源多且複雜，像中世紀城堡空間的嚮往、伊斯蘭空間水的運用……，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一種詩意的紀念性，但語言又卻極度封閉，這也是為什麼日後很少人能就著這條研究路徑持續發揚光大。這點跟同樣也在印度留下作品的柯比意就形成強烈對比。五〇年代前亦受柯比意強烈影響的康，為何在五〇年代後選擇這一條研究路線，或許我們可以在集中討論印度管理學院與孟加拉國會大廈等兩件作品時持續討論與觀察。

康在這趟羅馬之旅後，回到美國，所有的設計風格並沒有立刻為之一變，而是透過耐心的研究，逐步找到自己語言，並建立誘人的「系統」。

## 印度管理學院 (1962-1974)

印度管理學院在艾哈梅達巴德的分校，康規劃了第一批校舍，如今周邊已有更多校園建築，康這批房子我們姑且稱之「舊校區」。設計發展過程，康總共提了七個方案，從1962年11月14日的第一份概念圖開始，到1960年代末，當時學生宿舍先開始動工，主樓的圖書館仍然在修改中，過程之艱辛自不待言，所幸後來在印度成為重要建築師的多希也全程幫忙。整個「舊校區」是以一棟主樓（school building）為中心，包括圖書館、行政辦公、教室與學生餐廳等空間，圍繞著一個長方形廣場，今天稱為路易·康廣場，有點類似古羅馬市場的方場，四周圍有廊道環繞；往東南方向則布置了十八棟由正方形平面發展而成的學生宿舍，再往外有更小單元的教職員宿舍，最原先規劃（起碼在第六個版本的提案仍有）是在學生宿舍與教職員宿舍間挖湖，一則調節夏天溫度，二則可以讓教職員的住宿空間獲取更多寧靜，整個建築群設計得很像是一座幾何律動的城市，其規則的幾何形狀和層次分明的空間次序反映了建築群內各建築的不同功能。



左圖——  
印度管理學院，路易·康廣場與  
圖書館  
© 徐明松攝影



右圖——  
印度管理學院宿舍區一景  
© 徐明松攝影

設計方案發展過程中，主樓中間的廣場並不是空蕩蕩的。印度氣候要不就是酷暑，要不就是連幾個月下雨（6-10月），戶外空間極難使用，有寬闊廊道的半戶外空間就成為最佳活動的場所。在康1974年過世前所確定的最後方案可看到圖書館已移至廣場的邊界上，學生餐廳仍在廣場西側，廣場上也還有戶外劇場，康過世後，也不知是甚麼原因，學生餐廳被移至主樓西南側，並取消戶外劇場，造成今天的廣場缺掉一角，空蕩而無趣，廣場只剩下襯托圖書館尺度可能產生的紀念性。

整個構造方式完全以磚為主要材料，巨大的承重磚牆拔地而起，由做為補牆的混凝土聯繫著的磚砌緩拱構成牆面的開洞。不過康建築的尺度過大就會因牆太薄（視覺上）而顯得「脆弱」，因此最精彩的空間都在內部，當人在空間移動時，由於無法綜觀整體，牆厚剛好顯出亟欲紀念性的圍塑感，觀者會被他幾何所形塑的空間遊戲或紀念性尺度所吸引。像圖書館內兩座半圓形樓梯、學生宿舍兩種類型的內部開放空間與拱圈的關係……等等。

印度管理學院是一種「城市規劃」式的座落，每一個單元間都是一個隱逸式的客體，孤寂而神秘，像一座大修道院，使用者不敢隨意造次喧嘩。

## 孟加拉國會大廈 (1962-1983)

孟加拉國會大廈興建期間，柯比意在香港葛多數的作品已完工，可以看出兩者在空間的處理上巨大的差異。

1962年委託康規劃設計此案的業主是東巴基斯坦政府，完工後卻已變成孟加拉人民共和國（1972年1月脫離巴基斯坦獨立）。康面對的社會狀態就像印度管理學院般同樣的狀況，得到業主完全的信任，但卻面對一個動盪不安、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

規劃之初，國會大廈區（包括議會、法院與行政辦公）與休閒生活區（政府機構所屬的生活設施，包括學校）是同時被安置在基地北側一塊幾近正方形的土地上，國會大廈區

左下圖——  
孟加拉國會大廈宿舍區  
© 徐明松攝影

右上左圖——  
孟加拉國會大廈斜側面一景  
© 徐明松攝影

右上右圖——  
孟加拉國會大廈，1962-1983  
© Raymond Mei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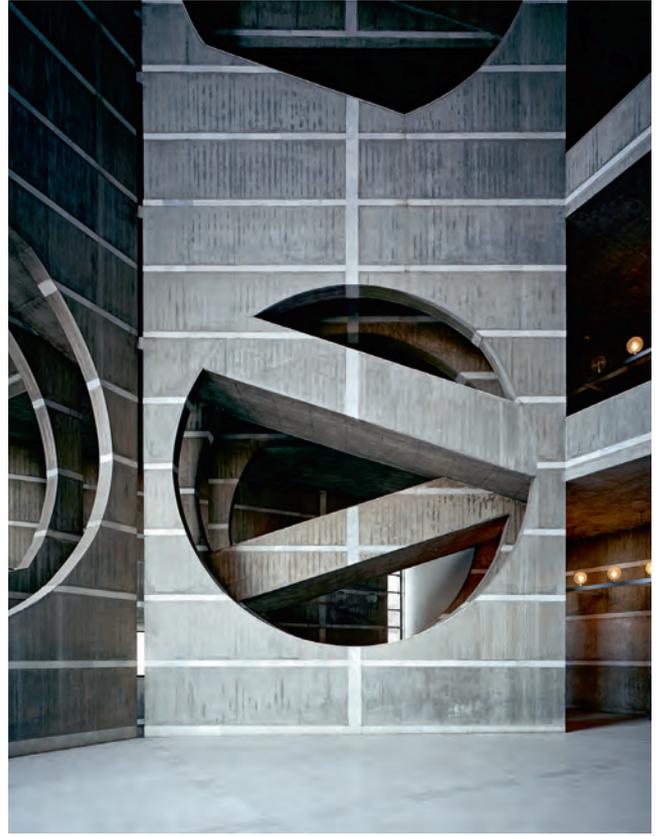
在東側，休閒生活區在西側，支援性的設施則以幾何狀散落於四周，兩區主要建築看起來皆像是封閉式的城堡。不過 1963 年 3 月提出的新方案則大幅度修改了配置，國會大廈區塊在南，休閒生活區在北，之間呈軸線。到 1964 年 5 月的提案則可看出國會大廈區塊逐漸明確，休閒生活區塊所需空間卻漸次遞減。

國會大廈區塊完全是以議會大樓為中心配置，儼如一座中世紀的森嚴碉堡，有「護城河」環繞。參觀當天我們車停在南側大馬路上，距離那巍峨的神秘塔樓（議會大樓）還有四、五百公尺，即便這麼遠看，都不覺尺度很小。警衛室辦完手續，有人領著我們一路參觀，不准脫隊。來到進議會大樓前的大階梯，拉起了不准許跨越的警告標誌，得從另一側有安檢的狹小入口進入。這種狀況也出現在參觀柯比意香地葛那幾棟建築，因此大師為「偉大」建築提供的空間想像卻夭折於社會現實。印巴 1947 年以後分治的事實，造成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長時間的衝突，導致這些空間因安全問題無法正常使用。

剛提到的紀念性尺度大階梯，其下方隱藏了許多辦公空間（包括最高法院與秘書處），目的應是在壓抑所有其他空間的表現，讓議會大樓成為唯一的核​​心。這在講究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似乎顯得怪異，行政部門與監督的法院竟然被壓抑在國會之下。跟議會大樓一起被凸顯的只有兩側在湖畔邊的住宿與餐廳，猶如左右護衛。

我們再回到議會大樓，康在這棟建築上投注了許多心力，也最能傳達他心中極致的建築哲學。整棟建築是由八個各自獨立的幾何量體包覆著一個巨大十六邊形的會議廳，在十字軸線端點的四個幾何體，有點似曾相識的古典感覺，主入口大廳與西側端幾何體的平面，非常類似羅馬近郊蒂沃利（Tivoli）哈德良夏宮（Villa Adriana）裡部分空間的變形，之後在會議廳上再覆蓋上由伊斯蘭球形角體轉化而來穹頂，這種「房子裡的房子」在實務上並不是一種常見的空間處理手法。我們在康 1951 年從羅馬回來後，1954 年的屈蘭頓猶太社區中心（Trenton Jewish Community Center）做了第一次嘗試，這種對幾何的極端崇拜是一種非常古典的手法，1961 年理察醫學實驗大樓康所強調的空間單元分離也





是這種研究的另一種表現，在看似理性的背後，康一步步帶我們進入他沉思冥想的神秘世界，1965年的沙克生物研究中心將此研究路徑帶至不可言喻的詩意境界，最後在孟加拉國會大廈畫下句點。

## 結語

孟加拉議會大樓的幾何空間的組織方式讓人聯想到義大利十八世紀建築師皮藍內西（G.B. Piranesi, 1720-1778）所做的版畫，特別是學院（Collegio）與馬齊歐廣場（Campo Marzio）兩幅，許多建築史學者已指出皮藍內西那極具想像力、隨意繁衍的幾何形式似乎是用來消解或隱喻即將瓦解的古典舊體制，而康在柯比意、密斯與葛羅培斯之後仍再談舊制度的瓦解？當然不是，康是想鄉愁地重建那不可尋回的舊制度。為那不確定的「美國性」找到出口，或像塔夫利所說的「設置了一個安全閥，為想（且得到允許）接受這深層事實根源的人打開了一條出路：將建築倒置面向自身，使深陷困境的形式自主性得到合法地位」<sup>3</sup>。

康始終都不是容易簡單歸類的建築師，分析康必須先接受語言體系的多元與龐雜，耐心爬梳隱藏在形式底下的文化意欲，這樣我們才能理解語言的歷史意義，也為台灣仍在摸索的現代性找到出路。

1 Manfredo Tafuri, 〈藏不住秘密的首飾盒〉（Les bijoux indiscrets），《紐約五人》（Five architects N.Y.），頁7，1981，第2版，Officina, Napoli

2 同註1，頁8

3 同註1，頁9